

博士文库

黄伟珍 / 著

何为经典 何以经典

——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的经典化历程研究

YINGGUO XIANSHI ZHUYI
XIAOSHUOJIA DE
JINGDIANHUA
LICHENG YANJIU

HEWEI JINGDIAN
HEYI JINGD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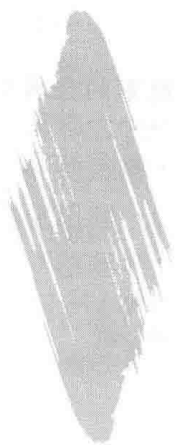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学出版社

博士文库

何为经典 何以经典

——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的经典化历程研究

黄伟珍 /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克坚
责任校对:朱辅华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为经典 何以经典: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的经典化历程研究 / 黄伟珍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7-5690-2208-7

I. ①何… II. ①黄… III. ①小说研究—英国—19 世纪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2256 号

书名 何为经典 何以经典
——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的经典化历程研究

著者	黄伟珍
出版地	四川大学出版社
发行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书号	四川大学出版社
印刷	ISBN 978-7-5690-2208-7
成品尺寸	四川盛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张	148 mm×210 mm
字数	7.25
版次	226 千字
印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定价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4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选题依据	(3)
第二节 研究思路	(10)
第一章 经典化理论的渊源	(17)
第一节 关于“经典”	(18)
第二节 本质说	(22)
第三节 建构说	(24)
第二章 狄更斯的经典化历程	(30)
第一节 狄更斯小说的艺术性	(30)
第二节 狄更斯在美国的经典化	(47)
第三节 狄更斯在中国的经典化	(70)
第四节 新媒体与狄更斯作品的传播	(79)
第三章 盖斯凯尔夫人的经典化历程	(95)
第一节 盖斯凯尔夫人关于“堕落的女人”的书写	(95)
第二节 盖斯凯尔夫人小说的艺术性	(111)
第三节 盖斯凯尔夫人在英国的经典化	(129)
第四章 奥威尔的经典化历程	(142)
第一节 奥威尔的创作生涯	(142)
第二节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奥威尔	(168)
第三节 奥威尔在美国的经典化	(180)
结 语	(207)
主要参考文献	(212)

绪 论

19 世纪是英国历史上的关键转型期，随着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领导权的逐步加强，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人类个体的生存得到了持续性的关注，这也让小说成为这个时期最为主要的文学创作方式之一。到了 21 世纪的今天，经过了一百多年的考验，许多作家的作品仍是当代脍炙人口的经典，如简·奥斯汀 (Jane Austin)、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威廉·萨克雷 (William Thackeray)、托马斯·哈代 (Thomas Hardy)、勃朗特姐妹 (Brontë sisters) 和乔治·艾略特 (George Eliot) 等等。国内对这些作家的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且大都是从文本内部因素分析其作品，如人物分析、语言艺术和叙事技巧等等。在文学史上，并非每一部经典作品的经典化过程都是一帆风顺的，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① 可见，“经典”并非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内在品质，它与文本外部的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关于 19 世纪英国文学的研究，虽有一部分是从外部因素研究的，但主要仍集中在翻译文本研究或批评史的角度，如《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以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

^① 詹姆斯在《小说的艺术》一书里写道：“《包法利夫人》是对第二帝国统治下的充当社会道德监视者的上流社会的礼仪的一个冲击，福楼拜被人说成一部激起公愤的猥亵作品的作者而被提出公诉。这部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部让人大肆指责的作品。”详见〔英〕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亨利·詹姆斯文论选》，朱雯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年，第 135 页。

的三个中译本为例》《翻译在外国文学经典建构中的作用——〈简·爱〉汉译研究》《当代英美狄更斯学术史研究（1940—2010年）》等。这类研究很少涉及这些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其他重要的外部因素（如意识形态、知识精英的评论和传播方式等等）对这些作品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典化的重要影响。通过对19世纪英国小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典化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经典的生成机制和相应的渠道，这对中国文学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无疑是一大启示。

本书重点审视19世纪英国小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典化演变过程。选择19世纪英国小说作为考察对象主要出于以下三个考虑：首先，19世纪的英国在工业化、民主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经历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小说在这个时期悄然成为作家们主要的创作模式之一，^①各种社会变革和技术革新对文学作品经典化过程有着显著而深远的影响。研究这个时期的小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文学外部因素与文学作品经典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性。其次，这个时期产生了大批我们耳熟能详的小说家，而且由于印刷业的发展，许多历史文献都有迹可循，有利于我们从新历史主义的维度，挖掘各种边角资料并尽可能还原当时的社会概貌。最后，这个时期还诞生了一大批特殊的写作群体，即勃朗特姐妹等女性作家，她们作品的经典化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她的不同题材的小说的关注度是大不相同的。通过分析她们作品的经典化历

① 19世纪著名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指出，当时的英国几乎就是一个读小说的民族，从现任首相到最近雇来的下房丫环无一例外；评论家鲍里斯·弗特也认为，当时不论何种出身，无论是伯爵夫人还是农家姑娘，是年老的律师还是年轻的大学生，都在阅读小说，小说成了人们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英〕R. C. 泰利：《维多利亚时代的通俗小说，1860—1880》，伦敦：麦克米兰公司，1983年，第2页；〔英〕安东尼·特罗洛普：《自传》，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些促成边缘向中心转换的各种要素。

第一节 选题依据

“何为经典”关注“what”,即“经典是什么”的问题,而“何以经典”则重点关注“how”的问题,即经典是如何生成的。这两个短语中也包含了经典化讨论的两大议题,即关于经典是否有之所以成为经典的“特质”?抑或经典只是一种“建构”呢?

(一) 文献综述

关于经典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讨论得较为激烈,这与西方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等理论对二元论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有重要的关系。在中国,关于经典的讨论虽然在21世纪初被提出,但真正地成为显学则是近十年,尤其是2010年后的事情。这除了学术方面受“西学东渐”思想的影响外,更为重要的是与中国当下对“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的探讨有关。下面将主要通过我国目前最大的国内期刊数据库CNKI和近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情况,来探讨我国目前关于经典化历程的研究现状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选择这两个数据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果说CNKI数据库让我们了解到已有的关于经典化研究的成果,那么国家社会科学项目立项的数据库,尤其是近五年的立项情况,则可以帮助我们管窥许多正在进行的关于经典化研究以及未来几年的可能成果,这也是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结题方式(专著、论文或报告)所决定的。因此,CNKI数据库提供了已有研究的线索,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则让我们看到未来的研究趋势。下文将对这两大数据库搜集的材料进行整理并分类探讨。

通过材料的分析与整理,笔者发现,目前国内关于文学经典化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

第一大类从理论层面探讨经典化。其中《经典》(2004)、《经

典修正》(2006)、《外国文学经典研究述要与前瞻》(2015)等几篇文章主要对国外关于经典理论渊源及其发生语境做了较全面的梳理。而以下这些文章主要从理论层面探讨经典化过程中的问题,如《经典背反及其他》(2010)、《“经典焦虑症”透视——“后文学”视野中的“经典问题”研究》(博士论文,2010)、《戏剧本质体认与中国现代戏剧的经典化运作》(2013)、《论“经典”:对一个文学概念的问题式考察》(博士论文,2014)、《试论文学经典化的动力机制》(2017)、《“视觉转向”与“文学经典再经典化”的演化逻辑》(2017)、《文学经典的时代重构与政治气候的风向选择》(2018)等等。

第二大类主要从历时的角度探讨中国文论或文学在我国本土的经典化过程,如:《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2006)、《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2006)、《沈从文文学经典化研究》(博士论文,2011)、《宋诗经典及其经典化研究》(博士论文,2012)、《论清词的经典化》(2013)、《传统戏曲的经典化与再生产——以〈赵氏孤儿〉为中心》(博士论文,2014)、《从边缘走向中心——莫言小说〈红高粱〉经典化的历史探析》(2014)、《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理念与路径》(2014)、《经典度、经典性与经典化之间的纽带》(2014)、《中国白蛇传经典的建构与阐释》(博士论文,2014)、《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构建、受制与应对》(2016)、《〈白鹿原〉经典化问题考察》(2017)、《论当代海外华人古体诗词的经典特质与经典化研究》(2017)、《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建构:论〈茶馆〉的经典化》(2017)等。

第三大类主要从共时或历时的维度探讨中国文论或文学在异域的传播或经典化的再生问题,如《中国文学经典在马来西亚的伦理接受》(博士论文,2014)、《经典的翻译与传播——〈诗经〉在英国的经典化路径探析》(2016)、《从汉语文学经典到翻译文学经典——杜甫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2016)、《鲁迅在德语世界

的经典化历程》(2017)等等。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到,国内关于经典化理论的研究虽然早在10多年前就有学者关注,但在学界成为热点问题,只是近五六年的事情。这和中国自身政治、经济地位的崛起,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密切相关。因此,笔者还通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据库,检索到近五年(2013—2017)来在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方面关于“经典化”研究的项目共21项,具体如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小说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2017)、《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传播文献叙录》(2017)、《日本〈左传〉学史》(2017)、《中国武侠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研究》(2017)、《中国古典文学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研究》(2017)、《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的日本转译作品研究》(2017)、《唐诗在德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2017)、《〈老子〉在法语世界的译介研究》(2017)、《中古五言诗的经典化研究》(2017)、《南宋科举视域下的古文经典化研究》(2017)、《汉语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2016)、《郭沫若翻译作品版本演变研究及语料库建设》(2016)、《唐诗翻译在当代美国的接受和影响研究》(2016)、《凯特·肖邦的经典接受与中华文化阐释研究》(2016)、《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化机制研究》(2016)、《西方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1714—1919)》(2015)、《网络文学的经典化与“主流文学”的重建研究》(2014)、《中国文学在西班牙的翻译与传播研究》(2014)、《中国大陆当代小说在英语国家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研究》(1949—2013)(2014)、《李渔在英语世界的历时接受与当代传播研究》(2013)、《17、18世纪莎士比亚经典化问题研究》(2015)。在这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除了《中古五言诗的经典化研究》(2017)、《南宋科举视域下的古文经典化研究》(2017)、《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化机制研究》(2016)三项属于上述第一大类或第二大类的经典化研究,《17、18世纪莎士比亚经典化问题研究》(2015)和《凯特·肖邦的经典接受与中华文化阐释研究》(2016)两项属于外国文学

在西方本土的经典化研究，其余 16 项中，关于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传播的研究占了约 85%，这一类研究可以算作上述第三类经典化研究。可以预见，随着这些项目逐步完成，学界将会出现大量关于中国文学海外译介和传播方向相关方面的论著或论文。

从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来看，上述第二大类的研究，即探讨中国文论或文学在本土经典化的研究，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这类研究多涉及我国经典的文论或文学在本土的再生与衍变。鉴于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以及中国文学的源远流长，此类研究立足本土文学的发展脉络，从历时的角度审视经典作品在不同的时期展示的不同的风貌，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在遭遇多样而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文化语境的时候，文学经典化如何做出各种应对。这对于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化历程，并思考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建构符合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经典作品，有着重大的意义。除了这类研究外，学界还有不少关于经典化形成的理论性探讨，这些研究可以促进我们对国内外经典研究的现状和趋势的了解，同时可以深化我们对经典的认识，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典理论。

（二）选题意义

上述第三类研究（即主要从共时或历时的维度探讨中国文论或文学在异域的传播或经典化的再生问题）近几年逐渐呈升温趋势，这也符合中国发展的现实，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地位和国际地位的崛起，对外文化的交流势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除此以外，这个现象还和西方对中华文明重新燃起的兴趣有关。中西方文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相互渗透的关系。特别是自 17、18 世纪，欧洲上下刮起了一阵“中国风”，当时西方的许多思想家都对中国古代哲学抱有极大的憧憬，试图将中国文明当作拯救西方日趋物质化和世俗化的社会病的良药。19 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上处于先行序列的国家开始贬低在发展序列上靠后的东方国家。到了 20 世纪，过分强调工业化的社会弊端日趋明显，西方又开始将目光转向东方，试

图寻求解救西方道德沦丧和精神贫瘠的良药。由此可见，西方每一次对东方的兴趣都是源于对其自身文明或文化的反思，正是古希腊哲学中不断强调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因此，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在西方的接受，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促进我国优秀的文学和文化“走出去”，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

国外也有大量研究中国经典的汉学家，在中西文化沟通中，他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相比之下，中国对于西方的了解虽有“面”的广度，但在“点”的角度，却远没有西方对中国的研究那样深入。在文学经典化的问题上，我们有不少关于西方经典化理论的来龙去脉的研究，也有不少关于我国文学在本土以及在境外的经典化的研究。毋庸置疑，这些研究可以深化我们对经典化的认识，对于我们如何讲好中国的文学，如何让中国文学走出去，也是大有裨益的。但在我们过多关注这方面的研究的时候，却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我们对于西方的经典化的理论研究不是基于其具体的文学案例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基于西方人的理论之上的，也就是我们对西方的经典化理论采取了一种“拿来主义”的做法。事实上，这种做法也无不可，因为东方西方，此心、此理皆有相通之处，但同时也要注意，二者之间亦有相异之处。要研究中国文学在境外的经典化历程，需要做译介和传播研究，对西方的经典化理论研究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文学经典化理论的认识。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学者眼中的经典化理论是基于西方的视角对文学经典化现象的概括和总结，有其自身的理论发展背景。但源于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面对同样的现象的时候，中国人得到的结论和思考未必与西方学者完全一样，两者认识的差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看待中国文学经典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因此，要想更好地推进我国文学的经典化研究，我们有必要回到具体现象中，回到经典化的个案分析中去。

我们需要基于中国本土的现实，以中国人的眼光去观测西方具体的作家和文学作品在经典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具体的问题。东方人

看西方经典的眼光并不必然就等同于西方人看西方经典著作的眼光，从理论的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学者以中国的姿态解读西方经典作品的经典化过程，既要看到西方的视角，同时也要带入中国的视角，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其经典化理论的来龙去脉，才有可能在国际上形成自己的话语。

更为重要的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相应的参照体系，它可以从一个侧面观照中国文学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反思中国文学如何更好地在世界范围内经典化。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关注中国文学如何在海外经典化，还要研究在西方世界里，一个国家的作家或文本是如何在另外一个国家实现经典化的。根据文献梳理，可以看到，目前国内关于经典化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大类和第三大类，其中第二类主要探讨中国文论或文学在本土的经典化过程，更偏向于历时研究，第三大类重点关注中国文论或文学在境外的传播或经典化，具有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这两大类的研究都是以中国本土为立足点，研究中国文学经典化的方方面面。这类研究具有很强的本土意识，同时兼顾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我们认识经典化研究、促进中国经典文学在世界范围传播，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但如果我们能换个角度，看看西方文学在其本土和异域是如何经典化的，看起来这类研究的主体似乎与中国无关，但正如俗语所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参照体系。如果能比较好地从具体的现象和个案出发，分析西方文学家或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历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学在境内外的传播，可以从一个较为全面的角度审视文学经典化的机制。

西方文学史上有诸多可供人类共享的经典著作，中国的文学要想更好地“走出去”与西方文学进行对话和交流，首先我们肯定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较深了解，了解以前的文本经典化的历程；同时，我们也很有必要了解西方文学的经典化历程，只有这样，当中国文学到达西方语境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既以中国文学为本位，又能充

分考虑接受方的“期待视野”，讲好中国的文学故事。目前也有一些关于国外文学作品经典化的个案分析的例子，只是数量还很少。如2016年载于《国外文学》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经典化研究与女性主义》主要考察了某一特定的社会运动或批评流派的兴起对特定文学作品的经典化的影响，此外还有《经典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以〈堂吉珂德〉为个案》（2009）、《简·奥斯丁经典化的知识条件》（2018）和《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经典化——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及其作品为例》等。总体上看，我国目前对于西方文学的经典化研究，尤其是个案研究是十分匮乏的。任何一部作品，任何一位作家，在经典化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许多必然性的因素和偶然性的因素。从理论上分析西方文学之经典化的研究，可以深化我们的知识结构，进一步拓展广阔的学术视野。但就经典化本身的特质而言，理论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要想更好地向世界介绍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学要想更好地“走出去”，我们还必须分析西方文学经典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偶然性的因素。这就需要进行大量的个案分析，从而建立符合中国自身话语体系的经典化理论。诚然，西方世界对于西方文学的经典化理论可以给我们提供诸多启示，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立足本土，以中国人的视角去观测西方文学经典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我们自己的视角，而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尽快对西方文学作品或作家进行翔实的个案考察。

关于西方文学的经典化研究，目前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这些理论可以提供指导意义，但鉴于经典化的过程充满复杂性和偶然性，我们除了研究经典化文学作品的总体原则外，还有必要从微观层面，即从个别的文本或文学家入手，研究其在经典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做到“点面结合”“心中有数”，为中国文学经典走向世界做好充分的准备。

第二节 研究思路

本书以英国 19 世纪到 20 世纪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选择这个时期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两点考虑:首先,这个时期是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许多文学作品至今仍是西方甚至世界范围内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其次,这些作家的创作高峰期距今一百年左右,相比于早期的英国作家,我们能更好地利用当时报纸或杂志记载的书评和相关报道,而比起研究当代作家的经典化而言,研究与今天有一定时空差距的历史时期的作家,就时间跨度上看,无疑有利于我们从线性上观察作家们的经典地位变化,从而更好地研究造成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

文学是社会现实的再现,又在一定程度上建构着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感知。它既是消费性的,也是生产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历来重视经典著作的魅力。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提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们向世界揭示的真理,比一切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还要丰富得多。恩格斯也说过,自己从巴尔扎克那里得到的启示,远远大于从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加在一起学到的东西。因此,本文主要选取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的作品,如盖斯凯尔、狄更斯和奥威尔等小说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审美特质、文学翻译、生产、传播、批评机制和课程设置等角度,多方位探讨经典之所以形成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

所选的三名作家都比较有代表性。其中,狄更斯与许多去世后才显名于世的作家们不一样,他在世时就是一位“明星般”的作家。他的影响力不仅在于创作了许多关涉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问题,唤起人们博爱与怜悯之心的作品,还在于他自身的成功就是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们所倡导的白手起家、自学成才的典范。在印刷术迅速发展、报纸和杂志愈来愈具备公众影响力的 19 世纪,狄更斯经营着两大报刊——《家常话》(*Household Words*)和《全年》

(*All Year Round*), 并与当时最受欢迎的杂志《潘趣》(*Punch*) 的主要撰稿人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也是狄更斯的时代。通过对狄更斯在 19 世纪成为经典作家的个案研究, 我们可以审视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的一些共性。

狄更斯的经典化值得人们特别研究, 不是因为他一直保持经典的地位, 而恰恰是因为在某些历史时期, 他的经典地位发生了变化, 而研究这种变化后面的深刻文化原因和历史原因, 则构成了经典化研究的主要命题之一。虽然在 19 世纪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 狄更斯都被视作西方文学史上一颗璀璨之星, 但 19 世纪后期以来, 尤其是 20 世纪早期, 在现代主义的冲击下, 掀起了一股反对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传统的飓风, 当然也包括作为维多利亚时期标志的狄更斯的作品。正因为如此, 有必要把狄更斯置于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中, 去考量其作品经典化的外在因素和内在特质。

选择狄更斯作为研究对象, 除了以上两个原因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狄更斯不仅是“英国的”, 他还是“世界的”, 就像莎士比亚一样。狄更斯作品面世不久, 就让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民众趋之若鹜, 而在半个世纪之后, 在处于重要历史转型期的中国, 知识分子出于经世济国的殷切希望, 大量翻译狄更斯的作品(许多作品甚至可以算是“创造性的翻译”), 在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就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鉴赏的“影响”而言, 在知名度上, 狄更斯是仅次于莎士比亚的英国作家。当然这样的结论似乎很难有非常确凿的数据, 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文学现象做一个大概的猜测。在维基畅销书单上,《双城记》被看作是“在任何时代都是最受欢迎的作品”, 另一数据表明狄更斯是全世界被翻译得最多的 25 名作家之一, 在中国翻译的外国作家中, 他位居第 9, 在埃及, 他位居第 4。在所有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们中, 从 1978 年开始, 狄更斯小说有 2110 个翻译版本, 仅次于拥有 2395 个版本的柯南·道尔(Author Conan Doyle), 排在狄更斯之后的是拥有 2041 个翻译版本的罗伯特·史蒂

文森 (Robert Louis Stevenson) 的作品。^①

除了探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文豪狄更斯外,本书还将讨论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女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 (Elizabeth Gaskell) 的经典化过程。盖斯凯尔夫人的地位在生前可谓显赫一时,去世后则逐渐归于沉寂,到了2010年,再次“崛起”,进入伦敦威斯敏斯特“诗人角”,其地位从波峰到波谷,再到波峰,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同一作家前后的地位会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对于一位地位变化较大的作家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透视“经典化”背后的各种推动力。

选择盖斯凯尔夫人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盖斯凯尔夫人的身份比较特殊,她是一名女作家,同时也是一名具有典型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特质的作家。与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相比,盖斯凯尔夫人的经典化可谓一波多折。2010年9月25日在其200周年诞辰纪念日上,盖斯凯尔夫人的名字被正式绘到了“哈伯德纪念彩绘花窗”上,这意味着她在英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获得官方认可,正式成为少数进驻“诗人角”的女作家。尽管在19世纪中叶,盖斯凯尔夫人是与狄更斯齐名的当红作家,多次在后者举办的《家常话》杂志上发表连载小说,其小说《玛丽·巴顿》更是深得当时文坛活跃分子卡莱尔等人的盛赞。但在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由于女权运动的兴起,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家身份可谓一落千丈,盖斯凯尔夫人的名字逐渐被人淡忘。选择这样一位经典地位充满争议,声誉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女作家作为研究对象,无疑能更好地说明经典的生成与文学场内外因素的关联。

其次,盖斯凯尔夫人一生创作颇丰,作品内容涵盖了劳资矛盾问题、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冲突的话题,同时也包含了关于家庭伦

^① Regenia Gagnie, "The Global Circulation of Charles Dickens' Novels", *Literature Compass*, 2013 (10): 82-95.

理、社会道德和宗教观、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几番沉浮，但包括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内的不同评论家都对其作为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的笔法赞赏有加，就连对她颇有微词的塞西尔也承认她能“敏锐把握细节”^①。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不同于社会学家们冰冷的数据，盖斯凯尔夫人用独特的文学语言再现了社会问题。正如玛丽·普维（Mary Poovey）认为的那样，詹姆斯·菲利普·凯（James Phillips Kay）和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等人使用石灰建筑和缩短的寿命等数据、图表说明当时的贫困，而盖斯凯尔夫人小说关注人物日常生活，使用简单的家庭意象预示贫穷，如用茶具的匮乏和生燕麦餐说明贫困。^②

最后，盖斯凯尔夫人是英国近几年重磅推出的作家之一，并试图以此重振英国文学的士气。以乔叟、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到了近现代，以拜伦、雪莱等诗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和以狄更斯、萨克雷和哈代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仍不失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然而，到了20世纪，随着英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的沦落，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而英国文学在文坛上雄踞已久的地位也逐渐让渡给美国文学。这一点从我国近年来的外国文学研究状况中可以管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版了不少英国文学名著和批评文集，21世纪以来文学批评领域，关于美国文学的研究远远多于英国文学研究。在许多高校里，虽然设有英美文学本科专业，但几乎都是以美国文学、美国文化或美国研究为主。与美国研究相比，英国文学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地位。选择在这样的时机以盖斯凯尔夫人为个案，研究英国各方如何通过努力使其再次成为经典，无疑对中国文学如何

^① Lord David Cecil, *Early Victorian Novelists: Essays in Revaluation*. London: Constable, 1934. p. 198.

^② See Mary Poovey, *Making a Social Body: British Cultural Formation 1830—1864*.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 145.